

丁 钢 主编

中国教育：
研究与评论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第 1 辑

责任编辑 韦 禾

责任印制 田德润

责任校对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1辑/丁钢主编·一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丁钢主编)

ISBN 7-5041-2177-0

I . 中... II . 丁... III . 教育—中国—文集

IV . G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1183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2003339 传 真 6201380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262 千 印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印 数 00 001—5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编者之语



加强和拓展国内外学者在中国教育发展及其国际关系、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多方面领域的研究交流与对话，需要提供一个对话的中介和共享的学术平台，从不同的角度和多元的话语方式来观察中国教育。

这种交流和对话的迫切需要，不仅仅说明中国今天发生的许多教育的进展甚至问题，都已与全球社会在教育上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无法分隔的紧密联系；而世界也在密切地关注这个教育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已与全球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此意义上，中国教育研究已非仅以地域时空为规范的领域，其意义范围已具国际性。正如全球教育必然包括中国教育，而作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也应把中国教育的研究和发展置于全球教育视野之中。非此

即彼的形式逻辑在这里已不能揭示中国教育所包含的全部内涵与价值，而构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于是，中国教育研究必将扩大其固有的研究领域，也不再囿于东方和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研究模式，而且由于融入全球意识的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观念和方法，研究的内涵与价值得以拓展和张扬，更富有建设性。

显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止于建构多元和适应全球化的中国教育学术体系，而更注重提升中国教育与全球教育发展之间的必要张力，以期拓展中国教育在全球教育发展中的空间和作用。

2001年2月

目 录

学术研究与交流

-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1)
许美德

研究报告与评论

- 转制学校：事实、成因与前景 (75)
张民选

- 从转制学校看中国学校体制改革 (145)
赵中建

- 上海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与发展（1978—1998） (159)
丁 钢 刘德恩

- 全球视野和上海教育国际化 (203)
谢仁业

专题研究与讨论

- 选择和分配：中国教育知识历史的社会学分析 (219)
吴 刚

CONTENTS

ACADEMIC RESEARCH & EXCHANGE

- The Spirit of Modern China: Life Stories of Influential
Educators (1)

Ruth Hayhoe

PROJECT - BASED RESEARCH & REVIEW

- Converted School in Shanghai: Fact, Factors & Future
..... (75)

Zhang Minxuan

- Change of School System in China in the Light
Converted School (145)

Zhao Zhongjian

-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pen
Door in Shanghai: 1978 – 1998 (159)

Ding Gang and Liu Deen

- The Educational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Shanghai in
Global Vision (203)

Xie Renye

TOPICS OF CURRENT RESEARCH

Choice and Issue:

-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Knowledge History in Chinese
Education (219)

Wu Gang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
国际性中国教育研究集刊
教育科学出版社，北京

编辑委员会

主编

丁钢 (Gang DING)，中国华东师范大学，香港教育学院

编委

李玢 田正平 韦禾 吴刚 吴康宁 张民选

国际学术编审委员会

秦博理 (Barry KEENAN)，美国丹尼森大学

海迪·罗丝 (Heidi ROSS)，美国科尔门大学

韩友耿 (Juergen HENZE)，德国柏林洪堡大学

程介明 (Kai Ming CHENG)，香港大学

叶澜 (Lan YE)，中国华东师范大学

彭恩霖 (Lynn Webster PAIN),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

顾明远 (Mingyuan GU)，中国北京师范大学

卢乃桂 (Nai Kwai LO)，香港中文大学

尼娜·波勒维斯卡娅 (Nina BOREVSKAYA)，俄罗斯科学院

保罗·贝利 (Paul BAILEY)，英国爱丁堡大学

许美德 (Ruth HAYHOE)，香港教育学院

骆思典 (Stanley ROSEN)，美国南加洲大学

高诗弟 (Stig THØGERSEN)，丹麦奥尔胡斯大学

大冢 丰 (Yutaka OTSUKA)，日本名古屋大学

CHINA'S EDUCATION: RESEARCH & REVIEW

The International Referred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Studies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Ding Ga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hina*

Members

Li Bin, Tian Zhengping, Wei He, Wu Gang, Wu Kangning, Zhang Minxuan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Barry KEENAN, *Denison University, USA*

Heidi ROSS, *Colgate University, USA*

Juergen HENZE, *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 Germany*

Kai Ming CHE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an Y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Lynn Webster PAI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USA*

Mingyuan GU,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Nai Kwai LO,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ina BOREVSKAY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Russia*

Paul BAILEY,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K*

Ruth HAYHO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tanley ROSE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Stig THOGERSEN, *University of Aarhus, Denmark*

Yutaka OTSUKA,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The Spirit of Modern China: Life Stories of Influential Educators

许美德 (Ruth Hayhoe)

香港教育学院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内容提要：本文从叙事者的角度，对理解 20 世纪中国教育的发展作了初步的探讨。通过六位知名教育家的叙述，从他们的家庭和早期教育，直至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长达八十多年中国教育发展的主要图景。本文从把比较教育作为研究领域的特点讨论开始，并把叙事学的运用作为教育研究的方法途径。然后转向六位叙事者，他们的故事展开为四个部分：叙事者目前处境与地位的简略描述，1949 年以前的家庭影响和教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职业生涯，以及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的观点。其中，也关注到渡过他们职业生涯的那些大学和曾经生活及工作过的不同地区。力图认识和理解他们共同经历过重大变迁的历史进程。

Abstract: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initial and exploratory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is century from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six influential educators, beginning from their family and early school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areers, it provides insights into major developments in education over an 80 year period. The paper begins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as a field of study, and the use of narrative as an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It then turns to the six narratives, presenting them in four main sec-

tions—a brief depiction of each educator's present situation and standing, the influences of family and schooling before 1949, their careers under socialism, and their perspectives on the perio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1978. Some attention is also given to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y spent their careers, and the diverse regions where these are situated. There is an attempt to identify and understand the threads of continuity that held together lives lived through momentous change.

在二十多年的比较教育研究生涯中，经常有人问我，比较教育研究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一般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社会学术语。具体地说，比较教育研究是一种跨社会或跨文化研究，即，分析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学习与教学情况，以及从比较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探索与反思。然而，多年来广泛阅读哲学与历史的结果，却使得我常常以为，就比较教育而言，首要的甚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教育展开宏观的社会学研究。只不过，与社会学家在单一的社会背景下探索教育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模式不同，比较学学者通常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可以用来恰当说明这种交互作用的解释范式。

近年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那种从单一视角得出的实证主义的结构与功能理论假设，已被多种实验性的考察动向所代替，这些实验动向包括：在描述与解释社会现象时，引入人种学（ethnomethodolog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以及叙事学（narrative）等方法论。社会学领域发生的这些实验动向，无疑也为比较学学者提供了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我个人这些年来就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尝试将叙事学的方法引入自己的比较教育研究，并且越来越赏识一些社会学家在引进个人生活经历作为理论建构的基础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古德森和沃克（Goodson & Walker, 1991）曾对英国教育社会学启用叙事学方法论作过一次总体评价，其中他们指出，可以把这种理论发展趋势看成一项工程，即：“重新定义教育研究，以使‘教

师的声音’能够被人们清楚地大声地听到”(p.139)。此外，克兰德尼和康奈尔利(Clandinin & Connelly, 2000)还证明过，从特殊的个案或事例出发，也就是采取叙事型的思考和探索方式，能够发现，在交接地带，即，针对同一问题，形式主义的演绎论与作为一种“宏大叙述”的归纳论实际上是互相冲突的。

个人经历叙事作为一种方法，其所蕴涵的丰富意义在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女儿)的《大视野》(*Peripheral Visions*)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这种大视野中，贝特森从自己在以色列、伊朗和菲律宾的求学与教学经验出发，对这三个国家各具特色的社会文化中的基础知识学习过程进行了解释，不仅如此，她还比较了这三种学习过程与美国社会背景下的学习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贝特森的这项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实际生活中的人的成长，表明她在细节描写方面具有强烈的意识和扎实的功夫，显示出了很高的研究技巧，这些都为比较教育学者提供了有力的参照。(Bateson, 1994)

作为一名比较教育学者，我个人的研究重点是在深化对中国大陆社会教育结构的理解上。显然，与我所属国家的教育相比，中国教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结构。因而从一开始，比较教育与历史就是研究中国教育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如果不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不了解20世纪国外教育与文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便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的教育模式或结构及其广泛的社会文化渊源。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多是从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以及苏联借鉴而来，此外，其他国家，如丹麦、加拿大、意大利和新西兰也对中国教育产生了细微但却十分惹眼的影响。

一方面是引进国外完整的教育体系与结构，包括：1902年到1903年间，模仿日本建立中国第一套现代教育制度；1952年到1955年间，全面照搬苏联对整个教育体系进行改造。另一方面则是个人通过特殊的关系渠道，向各自喜欢的国家学习，以建立自己满意的教育机构。比如，蔡元培十分推崇柏林大学的教育制度，而梁漱溟则极力

想效仿丹麦进步主义教育家哥朗特维格（Gruntvig）的教育理念。

我的研究与写作横跨整个 20 世纪，其中有不少重要项目都是与别人合作完成的，它们涉及中国教育领域里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和层面（Hayhoe, 1984, Hayhoe and Bastid, 1987, Hayhoe, 1992, Peterson, Hayhoe and Lu, 2001）。然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某些教育机构的命运，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它将外来的模式与价值有机地融合进了中国教育漫长丰富的发展历程。我以为这些大学都是富有个性的，而且我还愉快地收集了许多 1978 年以后出现的大学校史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这的确是寻求新的自由、摆脱一体化限制以及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结果，因为在这之前，也就是从 1952 年开始，中国教育一直都受着苏联模式的支配。

当然，考察 20 世纪教育与社会变迁的规律，对研究中国教育仍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分析中国某些教育机构如何接受或抗拒这些规律也是很有价值的。毫无疑问，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描述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化、革命性的改造、帝国主义和依赖理论等等方面的社会学文献上，并指出中国社会语境中那些明显与这些理论解释不相符合的细节，将有利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1996, 1999；中文版, 2000）中，我曾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国教育与社会变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个方面是：一方面，考察 20 世纪中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重大改革与世界范围内的教育社会发展趋势的联系；另一方面，分析中国哲学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对确立改革基本原则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呈现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正是这两种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我个人的这些认识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获得的。首先是通过长期的阅读与观察；其次是通过与一些我非常熟悉的大学进行密切的合作；最后是通过我与中国一些学者在长期的交往中达成的那种互相信任的友谊。这些学者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自己的大学建设，并且写出了许多学术著作，培养了新一代年轻的教师与教育学研究人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没有写过这些人，而是将大部

分精力都放在了研究 20 世纪各重要时期的宏观体制变化上。然而，我确实被这些高校的不同经历和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因为在我看来，从它们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的核心价值冲突。这些高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其他一些高校。

本文的写作将围绕六位人物而展开。他们各自代表了一所分布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大学，并且都在高等教育甚至更高一级的教育领域里长期服务过。从研究个人入手，来探索大学的普遍特征，看上去似乎是一种更合逻辑的理路。然而，在我进行这种研究之前，我却要花费将近 20 年的时间做准备，直到我与这些学者建立起了良好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只有这样，我才可以邀请他们与我一起交流，了解他们在困难与动乱时期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思想。在写作《传记与社会》的过程中，Bertaux (1981) 曾指出：“真正关键的一点是社会学家能否与他所研究的人物对象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如果他不能被人物对象接受，不能与人物对象进行交流，那么他的研究便不可能顺利进行。”(p.9) 从我所研究的六位学者那里，我深感荣幸地获得了他们的允诺，得以有机会分享他们内心深处的思想。

在中加合作培养博士的重要研究项目的资助下，我的一位博士生于 1992 年对中国 1216 名大学生作了一次调查。该项调查在三个地区进行，分别是东部沿海的重要城市南京，曾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首都；中部城市西安，汉唐两朝的首都和文化中心；内陆边陲城市兰州，现为甘肃省的省会。调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兴趣和事业目标两个方面，并对他们父母和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作了数据比较。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是，就教育机会而言，学生的学历越高，其社会地位的改变速度也就越快，这一点在兰州表现得最为突出。南京学生祖父母为农民的比率为 52%，西安为 63%，兰州为 64%。母亲为农民的比率分别为：南京 33%、西安 45%、兰州 53%。父亲为农民的比率则为：南京 20%、西安 25%、兰州 38%。(Moody, 1995)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可以将那些建立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编写

教材并将知识传递给年轻一代的前辈们看成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发现，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摆脱农村贫困与无知的途径之一就是接受新式教育。本文所要叙述的学者故事多数都属于这种状况。他们当中，有三位学者出身寒门，两位学者的祖父母来自农村，只有一位是来自世系的书香门第。

作为将人物传记引入中国教育研究的初次尝试，选择六位学者的生活故事显然与这些年来我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私人交际网有着紧密的关联。六位学者中，每个人都与我有过近十年的来往与了解。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和他们形成了互相尊重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因此获得了彼此的信任。这份信任为我分享他们的生活故事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穿插其中，自然也成了互相沟通的桥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们为各自所属分布于中国不同地区的重点大学的教育事业发展献计献策，倾尽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虽然我的关注焦点是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上，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关注与他们有过关系的大学和地区，这样一来，我的写作也就很自然地会形成制度与地区方面的比较。

最困难的一点莫过于怎样开始这项研究，我究竟该怎样组织眼前这些繁杂的生活故事材料？最后我决定从描述他们现在在大学里的处境开始，这样做能使读者明白为什么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大家一听。紧接着我将转入1949年以前的情况，叙述他们的童年以及家庭和教育对他们的影响。在这之后，我会通过他们的经历，描述1949年到1978年间中国重大的标志性社会运动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涉及的内容是1978年也就是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写作将围绕这一时期他们的教育思想而展开。对他们来说，这一时期意味着他们终于获得了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广阔空间。

学者们的基本情况：他们所属的大学及地区

李秉德和西北师范大学

六位学者中最年长的是李秉德教授。自 1952 年以来，李教授一直任教于西北师范大学。该校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重镇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地区包括三个省份和两个自治区。该校成立于 1939 年。当时日军占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为躲避战火转移到了中国西北部，一直到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迁回北京。1952 年，按照苏联高等教育体系模式，该校被正式确定为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所国家重点师范大学。然而，1958 年，该校又被改名为甘肃师范学院，隶属甘肃省管辖。此后不久，它原来的地位便被位于西安市的陕西师范大学所代替，后者成了西北地区的国家重点师范大学。

尽管该校在制度上几经升降，但是李秉德教授一直是整个西北地区惟一的教育学博士点的核心带头人。80 年代初以来，由李教授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博士生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有的已担任着重要的职位，也有的在北京和南京等地工作。在他们当中，还包括第一位藏族博士。此外，他还负责过许多少数民族的硕士生培养工作。

李秉德教授编著了一系列国家级的教科书，在教育研究方法、教学论以及小学语文教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87 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文选，其中收录有李教授一篇关于教育战略问题的论文。一同收录的还有科学家钱伟长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关于中国社会其他方面的战略论文。这表明李秉德教授属于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李秉德教授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家庭被甘肃省授予“教育之家”称号。其中两个女儿是兰州市的大学教授，一心扑在生物学和化学教学工作

上。儿子则为工程学教授，曾先后担任兰州铁道学院的副院长、甘肃省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最近又被选为甘肃省副省长。

80高龄之际，李教授已是西北教育界最德高望重的学者，但他仍然坚守在研究生教学的第一线，并密切关注着该地区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与西北地区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兰州大学相比，李教授所在的西北师范大学只是一所省属高校，但是该校却在甘肃省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师资培养方面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并建立了一所国家级的少数民族师资培训中心^①。

也许读者可以从这样一个小插曲中更清楚地看到李秉德教授的真实人格。1992年10月，他应邀参加我们在多伦多举办的“跨文化知识”论坛^②。当时我与他协商一项中加联合培养博士计划。该计划允许12名加拿大博士生去中国的6所大学进行研究，同时选拔22名中国博士生和博士后来加拿大进行研究。结果西北师大来了4名博士生，计划完成后其中两名继续留在西北师大工作，另两名分别去了北京和广东。在那次会议上，李教授向我提出等1995年联合培养计划完成时，再进行新一轮的合作项目。我对他说，到那时我想先把继续合作的事情放一放，利用我的学术休假，以便全力投入个人的研究，毕竟一趟下来就是六年，需要花费大量的心血。然而他看了看我，却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休息一下。”有这句话就够了，我立即开始计划新一轮的1996—2001年的合作项目。

朱九思和华中理工大学

离开遥远的大西北，我们来到了武汉这座中国华中地区的重要城

^① 一次访问兰州时，我曾于1998年5月8日和12日，与李秉德教授有过两次长谈。之后李教授阅读了我的记录，并就一些细节作过澄清。

^② 此次论坛的论文，包括李秉德教授的全部发言，已分别用中英文出版。参见露丝·海霍等编著：《跨文化知识：东西方大学与文化》，多伦多与武汉：多伦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社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

市。华中地区北起河南省，南抵广东省和海南岛，包括六个省份。武汉是长江沿岸连接东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战略要地。此外，由广州至北京和东北地区的铁路干线也要经过该市。1950年华中地区成为中国重要行政区域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武汉市建立一批国家级的大学，为国家和地方建设培养专业人才。1953年，中国决定全面借鉴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新组建的华中工学院也在武汉正式成立。该院以工程系为基础，同时还兼并了包括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以及位于江西省的南昌大学和位于广州市的华南工学院等华中地区五所大学原有的工程系科。

华中工学院是一所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大学。其主要学科领域包括以下四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意义的工科，即机械工程、内燃机、自动化工程和电力工程。华中工学院地处工业中心，并直属于国家高等教育部，因而其地位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是相对重要的。它不仅一直趋向于一流理工院校的发展建设，并且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跻身于中国一流大学的行列。1982年，也就是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之后的第四年，教育部决定试办研究生院，华中工学院（后改名为华中理工大学）是当时22所被认为是有资格承办研究生院的大学之一。随后它又凭借其出色的科研水平，连续多年在国家大学评估中处于前10名至前15名的位置。

华中理工大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与一位富有远见的领导和学者是分不开的。这个人就是朱九思教授。从1953年该大学创立，到1984年退休，朱九思教授一直是该校的重要领导。1952年，即该校正式成立之前，朱教授就担任了临时委员会的副主席。接着又于1955年和1956年先后担任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1961年朱教授当选为该校党委书记。1972年起，他又担任起该校校长，直到1984年退休。“文革”时期，大部分教学人员和学生都被派往农村接受劳动改造，大学教育一时中断。然而，朱教授却利用这段空闲，对过去和将来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之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观点：大学应该研究与教学并重，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一些杰出的人才，拓宽课程